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著作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 史學研究叢書 · 歷史文化叢刊 —

皇權、近習與權臣： 南宋的外戚與政治

黃純怡 著

史家一向視宋代為「無外戚之患」的朝代，然而，就兩宋的歷史來看，北宋的確沒有外戚能夠參與執政，南宋卻有兩位權相：韓侂胄、賈似道兼具外戚的身分。本書以史料的論證與討論，讓讀者能一窺南宋在皇權、近習與外戚權臣交織之下的政治情境。

目次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4
第二章 南宋外戚的任用制度	13
第一節 授官與恩蔭	13
一 由父、祖名下蔭補得官	14
二 由后、妃及公主名下蔭補得官	16
第二節 俸祿與賞賜	21
第三節 約束與限制	25
一 不任文資，不掌兵權	26
二 不任二府 不任侍從官	31
三 不得與執政大臣與內廷往來	34
第四節 小結	39
第三章 帝位繼承與外戚	41
第一節 皇子的教養	42
一 皇子學官	45

二	皇子教育內容	49
第二節	帝位繼承下的競爭	52
第三節	紹熙內禪與寧宗的即位	61
第四節	理宗即位前的養子風波	65
第五節	小結	73
第四章	皇權、外戚與近習	77
第一節	近習的入門之階：閤門官與樞密都承旨	78
第二節	孝宗朝的反張說事件	94
第三節	內批、御筆與南宋的皇權	100
一	高、孝宗時期的手詔、御筆	102
二	光、寧宗時期的內降、御筆	108
三	理宗、度宗時期	114
第四節	小結	122
第五章	臺諫與黨爭	125
第一節	內禪與韓侂胄的得權	126
第二節	士人議論之下的韓侂胄	143
第三節	外戚與權臣之間：賈似道	162
第四節	小結	174
第六章	與政外戚、作風與士人評價	177
第一節	高宗的母族與后族	177
一	高宗的母族	177
二	高宗的后族	182
第二節	孝宗、光宗時期	187

一	孝宗的后族	187
二	錢忱、錢端禮	189
三	光宗李皇后家族	192
第三節	寧宗以後的與政外戚	194
一	寧宗楊皇后家族	194
二	理宗謝皇后、度宗全皇后家族	197
第四節	小結	200
第七章	結論	201
	後記	207
	附表 南宋外戚列表	209
	參考文獻	22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第一章 前言

南宋紹熙五年（1194），光宗的右史兼起居舍人彭龜年（1142-1206）直前奏事，進《內治聖鑒》二十卷，奏以祖宗家法，集為此書。光宗說：祖宗家法最善。漢、唐兩代都比不上，對待外戚之法最為嚴備。彭龜年曰：我這本書，主要是為了防止宦官、宮中婦女得以弄權，這些人如果看到這本書，恐怕皇上就很難看得到了。光宗回答說：不至如此吧。¹彭龜年在此時呈上他編好的《內治聖鑒》，是有他的深意。光宗懼內，對李皇后既愛且懼，與退位的太上皇孝宗又有心結，兩宮已許久不相見，面對彭龜年的直言，光宗僅以「不至是」來規避，但這也代表光宗對所謂的祖宗之法是很在意的。

對專業研究者而言，宋代史的基本知識之一，就是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以強幹弱枝為基礎的君主集權，其運作包含皇帝坐朝聽政，以下由二府：中書門下與樞密院的最高長官的理政與議政，群臣的集議以及臨時決策機構所組成。皇帝通常是最後的裁決者，而這個集團原則上排斥女主、內侍、外戚、宗室與武將參與其決策活動，故而宋代被視為「無外戚之患」的朝代。

然而，梳理兩宋的歷史，北宋的確沒有外戚能夠參與執政，南宋卻有兩位權相：韓侂胄、賈似道兼具外戚的身分，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這樣的提問展開。

¹ 王應麟：《玉海》卷130〈官制〉「紹熙內治聖鑒」，頁2502上至下。另見彭龜年：〈進內治聖鑒疏〉，《止堂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卷3，頁36；《宋史》卷393〈彭龜年傳〉，頁11996。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南宋「背海建都、背海立國」，²疆域大幅縮小，而北方外族的軍事實力卻遠勝於宋，雖然南宋可倚賴江南的經濟資源，創造出豐厚的財政收入，像是透過土地開發、推動海外貿易、茶鹽專賣、鼓勵商業等措施，開闢財源，然而歲幣的開支、發展水陸聯防的戰備能力、強化邊防及建立地方自衛武力等，也都是南宋所面臨在國防戰略上禦敵的沉重負擔。³因此，南宋以江南的自然環境為基礎，面對北方外族的進逼，在軍事對峙局面漸趨和緩之後，便以穩定政局為首要工作。正是因為不同的歷史情境，與北宋相比，南宋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都有著不同的特色。

以南宋的皇權與相權、臺諫之間的關係來看，北宋時期的臺諫制度的改變（由皇帝來任用臺諫）即成為黨爭的主要原因。而南宋的臺諫常與權臣合作，或權臣任用附和的言官來排除異己，形成臺諫力量無法箝制權臣。劉子健曾提出，南宋皇帝縱容權相才是主要的關鍵。⁴除了任用權相之外，皇帝對於言官，常用拖延敷衍、調護或抑言獎身及控制的方法來阻礙臺諫言事，也是形成權相的原因之一。而南宋軍政的特殊情勢，迫使宰執常須緊急處理軍務，因而兼知樞密使之職，形成「宰輔互兼」的現象。⁵

2 見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江山的長期穩定〉，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7年11月），頁21-40。

3 黃寬重：〈南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收入氏著：《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年7月），頁13-47。

4 劉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7年11月），頁12-13。有關宋代臺諫制度的研究，可參考刁忠民：《宋代台諫制度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1999年5月。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開封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5 梁天錫：〈論宋宰輔互兼制度〉，收入《宋史研究集》第4輯（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9年），頁275-308。

在這樣特殊的政治情勢之下，南宋從而產生北宋沒有的權相，這些權相較北宋的相權更為擴大，他們在人事任免與民政處理都有極大的權力，權相在臺諫任用親近的言官，以避免他們在朝政上受到其他士大夫的攻擊。最主要的，還是在皇帝對他們的信任與倚重，默許權相在朝政上的種種作為。

南宋權相共有四位，除了高宗時的秦檜、寧宗與理宗前期的史彌遠之外，寧宗朝的韓侂胄、理宗與度宗朝的賈似道皆具外戚身分，這點相當值得注意。由於宋代對外戚的待遇，一向是給予優遇及賞賜，而不會給予有實權的官職，以此來避免外戚干政。故而韓侂胄與賈似道的「特例」，自然有其特殊的背景原因，在其得權之前，外戚身分是否成為進入權力核心的一項阻礙，亦或士人們的反對，抵不過皇權的一意孤行呢？

本文的預擬方向，即在這樣的提問展開。筆者曾以《北宋的外戚與政治》一書探討北宋時期的執政外戚、與政外戚，發現在輿論與臺諫的制約之下，執政外戚想要有所作為，是相當困難的，反而謙靜、低調及遠權勢的作風，才能保持權位，否則很容易遭到官僚集團的攻擊，捲入政爭之中。⁶北宋雖有外戚的參政，但無外戚衍生的政治問題，而南宋是否也是北宋的延續？

過去史家對韓侂胄與賈似道的討論，似都集中在其得權原因及黨爭兩方面，兩人都是權臣，也有下面的一些共通點：

外戚出身，曾以蔭補官或恩補官。

曾參與皇位繼承的過程：有從龍之功，且在關鍵時刻得到皇帝

⁶ 黃純怡：《北宋的外戚與政治》（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頁79-80。

信任。本人有能力或之前政績不錯。

受到部分官僚的支持。

歷史評價以權臣甚至是「姦臣」看待。(如《宋史》將兩人都列入〈姦臣傳〉)

以外戚身分入主的權臣，以宋代一個士大夫常利用「祖宗家法」主導政策走向的時代，是極難想像的。士大夫大可以外戚弄權的歷史經驗，做為借鏡，驅逐權臣。就如孝宗時陳俊卿曾反對錢端禮任相，說：「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⁷，當時錢端禮為皇長子鄧王趙愔的岳父，任參知政事，最後未能任職執政，可見士大夫對此家法，仍是相當堅定執守的。

然而，如前所言，南宋還是出現外戚權臣，這樣的「特例」在南宋的政治環境裡，如何達成及產生，對政局又有何影響，此為本文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外戚」指的是皇帝的母族與妻族，尚包括皇帝的姐妹與女兒的夫族。在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王莽取西漢而代之的實例，東漢也是外戚當權，並且產生一定的模式，由先帝皇后擁立年幼的皇子，而自己再以太后身份輔佐，引用太后信任的親族（通常也兼具豪族身分）委以實權，但最後失敗者多，「陰、郭、馬三家保全，甚餘皆無不敗者」。⁸

7 《宋史》卷385〈錢端禮傳〉，頁11831。

8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臺北市：世界書局，1986年10月）卷3〈兩漢外戚之禍〉，頁41。

有鑒於歷代外戚弄權、擅權而導致國勢衰落的情形層出不窮，宋代的外戚也同樣成為統治者與士大夫防漸的對象，因此外戚在宋代一直沒有出現重大的政治問題，也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較少受到學界的注意。早期學者多半認為，宋代無外戚問題，如宮崎市定認為，宋代外戚在對於皇室內部的事情已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就好像把自己的女兒供奉給神明一樣，只能引以為榮，得到短暫的快樂，因此認為「無漢王氏之患」。⁹柳詒徵也說「宋代是看不見篡奪的時代」，¹⁰沒有外戚干政的問題。

張邦煒的《宋代皇親與政治》，首先提出「宋代究竟有無內亂」、「宋代是否形成內朝」等問題，並企圖藉由研究宋代宗室、后妃、外戚與宦官的關係來尋求解答，在第三章〈宋代外戚與政治〉中，張討論了一些從政受阻的外戚如錢惟演和張堯佐，也討論徽宗時前後拜相的韓忠彥、鄭居中，南宋的錢端禮、及權臣韓侂胄、賈似道。他認為在宋代的士大夫文化下，外戚想要居於權力中心，幾乎都必須承受排山倒海的抨擊與反對，就算是有如徽宗時前後拜相的韓忠彥、鄭居中，南宋的韓侂胄、賈似道，這些外戚都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原因，因此認為宋代對外戚能優遇加防範，法制嚴密，不給實權，才能避免外戚干政亂政。¹¹至於外戚得權的背景原因，張文當中則沒有再深入探討。

張儒婷《宋代外戚地位研究》，是以宋代的「待外戚之法」切入，探討宋代如何加強對外戚的限制，張的論文認為宋代對外戚是有嚴格的防範措施的，通過經濟、政治、日常生活交往來削弱外戚的特權，本文也是第一本有系統來討論外戚的出身、封賞和任官等問題的著

9 (日)宮崎市定：〈宋元の經濟狀況〉，收入《世界文化史大系》第12卷（東京：角川書店，1928年），頁337。

10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臺北市：正中書局，1964年再版）中冊，頁223。

11 張邦煒：《宋代皇親與政治》，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

作。外戚雖有特權，但卻有諸多任官的限制，本文對「限制」之下的「特例」雖也有一些討論，但可惜沒有對特例形成的因素作探討。¹²

拙著《北宋的外戚與政治》以北宋外戚為探討對象，並提出：外戚的任用，宋代有「矯漢唐之弊」的共識，因此對外戚有許多限制與約束，然而任何的限制與約束在皇權之下都是可以打破的。例如：北宋時的武將外戚家族李氏、曹氏，以及執政外戚王貽永、張堯佐、韓忠彥、錢惟演等人，都是曾被重用的外戚。皇帝在不同的情況下，仍會重用外戚，而不受祖制的約束。而外戚的種類、本身的才能或政績、與當權者的關係，也會決定這位外戚在朝政的地位。像是太祖重用王繼勳、太宗重用武將外戚如李繼隆家族等，徽宗即位初用韓忠彥，也是基於當時政局的需要，皇權的考慮並非只由其外戚身分著眼。¹³

前人學者對南宋政治及權力運作的討論不少。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討論南宋妥協、包容的政治手段和方式，保守謹慎的作風，以達成鞏固政權、上下安定的目的。本文也對南宋君權、相權、士風、胥吏之間如何運作「包容政治」有所闡述。¹⁴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透過朱熹時期的政治，討論士大夫政治文化，環繞著「國是」、「黨爭」的影響，作者深入討論道學家欲「得君行道」的理想，與理想的幻滅過程。¹⁵寺地遵則透過南宋前期政治的討論，回應南宋

12 見張儒婷：《宋代外戚地位研究》，吉林市：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6月。
對外戚任用的制度的文章，尚有苗書梅：〈宋代宗室、外戚與宦官任用制度述論〉，《史學月刊》1995年第5期，頁32-38。楊光華：〈宋代后妃、外戚預政的特點〉，《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頁62-67。白文固：〈宋代外戚恩蔭制度淺論〉，《青海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頁85-91。

13 黃純怡：《北宋的外戚與政治》（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

14 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收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7年11月。

1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市：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6月。

雖然有北宋政權的基本性質，但也因為南北抗爭的關係，出現徹底的集權主義。¹⁶

在皇權運作的制度上，內批、御筆、劄子等文書格式，近年來也是討論的焦點。由於這些文書形式大多不出於中書，而是由皇帝獨斷，往往會形成皇權與士人政治之間的衝突點，也容易形成近習或權臣干政的弊端。¹⁷小林晃認為，韓侂胄、史彌遠代表不同的權力型態。韓侂胄是透過皇帝掌握內批與御筆，而得權的專權者，而史彌遠則是代表士大夫輿論推動之下以宰執為領導的政治體制的恢復。¹⁸這種看法也與學者們如寺地遵、戴仁柱、何忠禮、韓冠群等不同，過去學者的看法是，認為韓與史皆為專權者，史彌遠只是取代韓成為官僚集團的領導角色，但權力結構沒有太大改變，而為了杜絕權臣的再度出現，在韓侂胄被誅後眾臣便呼籲「政歸中書」。¹⁹

對南宋黨爭與韓侂胄相關討論也相當多。沈松勤以文人的學術、文學與政治生涯與朋黨結合，討論南宋道學與反道學之爭。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程誌華探討寧宗時期的慶元黨禁，並指出反道學的本質其實是政治鬥爭。黃俊彥、小林晃以韓侂胄的得權、專權

16 (日)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市：稻鄉出版社，1995年7月。

17 近年來成書的有鄧小南、曹家齊等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鄧小南、曹家齊等編：《過程、空間——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日) 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內容有〈解讀宋代的政治空間〉、〈宋代地方政治管見——以劄子、帖、牒、申狀等為線索〉等文，均有相關討論。

18 見(日) 小林晃：〈南宋寧宗朝における史彌遠政權の成立とその意義〉，收入《東洋學報》第91卷第1期，2009年，頁35-64。

19 見何忠禮：《南宋政治史》（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02-4。(日)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市：稻鄉出版社，1995年7月。韓冠群：〈從政歸中書到權屬一人：南宋史彌遠專權之路〉，《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44卷第3期，2017年5月，頁150-151。

原因，兼及南宋寧宗時的政治大事：慶元黨禁、開禧北伐，黃俊彥並指出韓侂胄善於以政策合作的方式，籠絡不同的士人，以達成北伐的終極目標。²⁰

過去對南宋政治的討論以宋金和戰為多，近年來開始關注孝宗以下的政治情形。柳立言討論孝宗身為高宗的養子時，皇位繼承之下高宗的心態。張維玲則關注南宋中期以來道學家與近習之間的政爭。虞云國、張金嶺、方震華分別探討宋光宗、寧宗與宋理宗的即位與政治情形，使我們對孝宗以下的皇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²¹

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主編《劍橋中國宋代史》是劍橋中國史系列中最晚出版的作品，此書上卷於2014年出版。該書彙集了中、日、英文等研究成果，觀察了兩宋之間文人政治的興起、政局的發展、道學運動的興起。此外，它們突出了朋黨和皇權對宋政治文化的不穩定影響，以及強大的草原帝國像是遼、西夏、女真和蒙古對宋代的影響。²²就南宋而言，女真在北方的

20 沈松勤：《南宋的文人與黨爭》，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論偽學之禁〉，收入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5年5月，頁159-200。程誌華：《學術與政治：南宋「慶元黨禁」之研究》，新竹市：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黃俊彥：《韓侂胄與南宋中期的政局變動》，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年7月。（日）小林晃〈南宋中期における韓侂胄專權の確立過程〉，《史學雜誌》2005年，頁31-54。

21 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期3分（1986），頁553-584。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年5月。虞云國：《南宋行暮：宋光宗、寧宗時代》，上海市：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張金嶺：《宋理宗研究》，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方震華：〈轉機的錯失——南宋理宗即位與政局的紛擾〉，《臺大歷史學報》第53期，2014年6月，頁1-35。楊宇勳：〈宋理宗與近習：兼談公論對近習的態度〉，《中山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22 見（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美）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One: The Five Dynasties and Sung China And Its

征服，對南宋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恢復」也是南宋政局的課題之一，江偉愛在第九章提出，孝宗的政治集權方式顯現君主獨裁的特性，他也提到孝宗以內批與御筆來加強權力（頁657），甚至不顧宰相和樞密院的意見，向女真出兵。戴仁柱則在第十、十一章討論光宗到理宗的政治，他提出韓侂胄、賈似道是深宮中的產物，是權臣、寵臣，而非從文官系統發展而來。

從前輩學者的研究裡，我們看到對南宋的政治的幾個課題，都有很豐碩的研究成果，也幫助我在外戚政治的問題上，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與切入。孝宗時，錢端禮任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極受孝宗倚重，吏部侍郎陳俊卿力詆其罪，說「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又在進讀寶訓時，言及外戚：

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²³

錢端禮是孝宗長子鄧王妃的父親，鄧王那時還不是孝宗的太子，錢端禮急著登上相位，籠絡朝臣，恐怕也是因為外戚不與政的原因，但他的急迫，反而讓他受到攻擊，未能如願。其後，孝宗立鄧王為太子，錢端禮就以避嫌之故，不再任執政之職。

寧宗即位不久，彭龜年時任吏部侍郎，他眼見知閣門事韓侂胄因有從龍之功，數以在內庭干預政事，不禁提出警戒：

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最為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通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

Precursors, 907-1279 AD 2014.5. 中譯本《劍橋中國宋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2次印刷。

²³ 《宋史》卷385〈錢端禮傳〉，頁11831。

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²⁴

彭龜年為了制止韓侂胄得權，用祖宗待外戚之法，來勸說寧宗。正如司馬光曾言：「(本朝)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²⁵在上面的兩則史料內容上，我們都看到「祖宗之法」的力量。它是累積的，是一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貫徹制約精神的具體章程。²⁶它也是變化的，經由各朝、不同士人的認識與闡述，提出不同的解釋，以維護朝政的穩定。那麼，在彭龜年筆下的「祖宗待外戚之法」，是否真的能在南宋的情境下落實，成為對外戚參政的約制呢？

君主專制的時代，由皇帝的世襲制度所衍生的主要問題，首先是世襲制度之下帝王的教育，因為偏重儒家經典的內容，缺乏實務的歷練，容易為臣下所蒙蔽。就如劉靜貞所言：世襲得位的君主，不一定具備足夠的學養能力，或是政治興趣，來完成獨裁天子的政治角色。²⁷而這個問題在南宋，則更為明顯，就算皇帝背後有制度的支持，但在政治事務的處理上，因為皇帝本身個人能力、資質的限制，仍然不得不仰賴外力的協助，但這樣的結果，卻容易形成大權旁落。加上南宋皇帝常因沒有子嗣，而讓皇位繼承的過程，充滿波折。在此情形下即位的皇帝，皇權的實際運作，皇權與士人政治的互動又是如何？它對南宋外戚權臣的形成，是否有決定性的影響呢？

北宋時期的外戚，雖然有許多限制與約束，但仍有武將外戚家族

24 彭龜年：《止堂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卷五，〈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頁73。

25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收入《四川叢刊初編》，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40〈體要疏〉，頁2。

26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市：三聯書店，2006年9月。頁9。

27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市：稻鄉出版社，1996年4月。頁6。

李氏、曹氏及執政外戚王貽永、張堯佐、韓忠彥、錢惟演等人受到皇帝的重用，外戚的個人特質（才能與性格）、與當權者的關係，也會決定外戚在朝政中的地位。²⁸外戚在北宋並沒有像漢代一樣產生干政或亂政的情形，主要是因為宋代的政治環境與漢代不同，宋代士大夫監督力量的崛起、后妃家族勢微，都讓外戚的干政受到密切的監督。而祖宗家法的約束、后妃與外戚的自我約束等，也是原因之一。

君主專制的政治，雖然真正的決策者是皇帝，但基於當時政局的需要，外戚的任用還是十分常見。只是北宋外戚位高卻多少有實權，自然不足為患。在南宋卻產生如韓侂胄、賈似道等外戚權臣，本文希望在南宋情境下討論外戚權臣的形成，透過南宋的外戚參政，能更了解皇權、權臣與士人之間的運作關係。

28 參見黃純怡：《北宋的外戚與政治》，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